



17—18 世纪桐城 绅士家族闺秀研究

董佳贝 著



上海
著名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董佳贝 著

17—18 世纪桐城 绅士家族闺秀研究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研究/董佳贝 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7-5675-7201-0
I. ①1… II. ①董… III. ①女性—人物研究—桐城—
17—18 世纪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8525 号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研究

著 者 董佳贝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夏 玮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201-0/K·496
定 价 5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绪论/1

- 一 选题缘起/1
- 二 文献综述/4
- 三 论著结构/8
- 四 研究方法/11

第一章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生长之背景/13

- 第一节 土地与恒产观/13
- 第二节 仕宦之道与明清政局/26
 - 一 桐城籍官员的为官理念/26
 - 二 君臣角力——以张廷玉为例/31
- 第三节 家族文化/42
 - 一 家学：以性命为之经，以经济为之纬/43
 - 二 家风：守正避奇，达观主义/48

第二章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之婚姻/56

- 第一节 世代为婚的姻亲网络/56
 - 一 姚氏家族/56
 - 二 张氏家族/61
 - 三 方氏家族/66
- 第二节 婚姻与子嗣/72
 - 一 缔姻：一项重要的盟约/72
 - 二 妻、妾、子嗣：无关风月、承继为大/76

第三章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之生活/95

- 第一节 修内治以定秩序/95

- 一 孝妇、贤内助与为母之道/95
- 二 治家之道及参与公共事务/111
- 三 查产和温情：来自母家的支援/117

第二节 日用伦常与极端行为/128

- 一 两难选择：守节或殉节/128
- 二 身体自残/137

第三节 家庭之外：出游与旅行/139

- 一 桐城之游/139
- 二 长途旅居/143

第四章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之创作/156

第一节 教育、写作与女性文化/156

第二节 女性情谊——以陈舜英为例/162

第三节 闺中雅兴——以张令仪为例/171

结语/188

附录 明清桐城闺秀著述考/200

参考文献/228

一 选题缘起

近年来,随着社会性别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中国历史中各类女性的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海内外学者的目光大多聚集在了明清这一历史时段。17—18世纪,伴随着政治变革、经济新动向,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女性生活也在缓缓发生着重大变化。正如高彦颐谈到的那样,明末清初,在城市化、商业化和印刷文化的推动下,精英阶层的女性将她们的影响扩展到了新的领域,将亲朋关系拓展到了家居范围以外的空间。^①盛清时期(约1683—1839)^②,随着传统的复兴,女性的理想、行为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国家家庭政策的推行使得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在伦理关系中的地位被再定义。同时,明、清两代亦是中国历史上才女辈出、风流绵长的一个时期。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明清时代女性作家多达3 000余人。^③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女性的文学活动和大量文学作品铺展成中国历史上灿若云霞的巨幅长卷。从上述种种考量,明清女性研究无论是从自身价值还是从可行性上来说,都是独树一帜的。

不过,该领域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首先,既有研究关注女性文学活动,分析女性文学作品的较多。例如,沈、叶文学世家才媛、蕉园七子、随园女弟子等才女群体长期被海内外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反复加以探讨。相形之

① 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蓓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 关于“盛清”时期,本文采用曼素恩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中的定义:“‘盛清’(High Qing era)指的就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时期。习惯上,此称也用来指称中国‘广义的十八世纪’。”参见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22页。

③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张宏生增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7页。

下，对当时女性具体生活形态的发掘和再现，以及女性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解析似不够丰富。其次，区域的不平衡性。由于资料和学术风气等原因所限，研究者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江南地区，中国其他广袤地域的女性研究明显开发不力、涉足不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学活动、性别文化等一直被研究者和世人所持续关注，滋生了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然而，近十年来，学术界已逐步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具有多歧性：业已现代化的沿海地区都市与尚处于中世纪的内地并存；最传统的农业经济、自耕农社会与工业化、融入全球经济的地区并存等。实际上，不仅近代社会如此，在清代前期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当然，其多歧的一面不如近代社会那么明显。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要深刻认识中国，应该首先意识到这样一点——“中国是一个世界”。江南地区只是中国的特例，并不能代表中国腹地的情况，更不能代表全部的明清中国。史学上如此，文学上亦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更广大范围的明清中国应当如何呈现？要回答这一问题，则有赖于对中华帝国其他区域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笔者的视线落在了地处长江北岸、七县通衢的城邑——安徽桐城。明清时期，在科举制度催生的社会流动之下，桐城士人常奔赴周边的南京、杭州、苏州等文化核心地带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如读书、应试、结交、入幕等。并且，在十七、十八世纪，桐城地区拥有庞大的京官群体，尤以桐城的张氏、姚氏二族为著。本乡仕宦之盛，以致多有大臣上奏，请皇帝限制桐城官僚家族势力的发展。在官员生涯结束后，这些士大夫一般都回归乡土。他们将其他地区，特别是京城和江南等地的文化因子源源不断地带回了桐城。从女性这方面来说，因为跟随家中出仕的男性亲属，外地随宦、往来各地是桐城绅士家族女性人生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经历。通过上述渠道，地处华夏东部的桐城并不是一个闭塞的小天地，它与其他地域，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区保持着顺畅而密切的沟通和交流。另外，正如《江南通志》所载：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皖介两服之间，沉潜高明，盖兼具矣。桐城固然不如江南地区占尽经济、文化风气之先，但由于其地域和人文特点及独有的通融性和包容力，兼收长江中、下游之文化特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桐城比江南地区更具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理学昌明之地，桐城的风习素以保守著称。但恰恰是在这个奉传统为

圭臬的地区，自明中叶以后直至近代，涌现出大量卓尔不群的女性。翻检记录着桐城闺秀的各类文本，她们的身份和面目是交错不一、层叠缠绕的。在儒家传记、地方史志中，她们是贞妇、节妇、太夫人、孺人等光鲜堂皇的名号；在本地男性亲属的笔下，她们是可敬的楷模、睿智的女神、永恒的归属；最后，在她们自己的作品中，这些女性又是个性鲜明、不乏棱角的。在陈说着个体的隐秘心情与愿望的同时，她们也频频颌首认同着男性目光中塑造的自身形象。

可叹的是，她们在生活着的那个年代未被遮蔽，却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被轻轻翻开后又随意合上，甚至尘积高阁、乏人问津。本文的研究对象——明清时期安徽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群体，在女性文化、文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这种被忽视的现状与该地区、该群体的实际研究价值形成了鲜明对比。桐城绅士家族闺秀在明、清两代以女教、母范闻名于世，被打上了道德先锋的耀目标识，亦被最高统治者标榜为儒家伦理规范的生动模板；同时，她们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千古芳名。曼素恩曾在《缀珍录》一书的结尾特别提到，集中了清代70%女性作家的江南核心州县——钱塘、常州、吴县、嘉兴、常熟、海宁等，被周边5个小地点所簇拥，形成了一条才女“卫星带”。这条卫星带的5个点中，桐城赫然在列。另据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清代桐城女作家的人数多达60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位居前列。

历史未曾湮没她们的徽音，我们则更不应将礼法、文风两盛之乡的这一女性群体就此遗忘。本书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首次对明清时期桐城女性著作及个人生平小传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梳理、归纳和总结。透过上述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该地区文学活动的认识，亦能更好、更全面地展现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全貌。

其次，本书通过对女性生活实态的解析，对17—18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群体进行较完整的多维度研究，借此拓展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研究的视域。在利用文学文本勾勒女性心灵世界的同时，本书还将运用更为广泛的各类文献材料，从中钩稽出有关女性日常生活的种种感性而鲜活的细节，以连缀成女性社会文化生活的全息图景。因此，兼采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视角，是本书的基本研究路径，也试图弥补既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面。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研究者可以随心所欲解读的对象。笔者将努力避免孤立分析和任意解读文本的倾向，以贯通古今、融合文史的读书方式，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社会、文

化和文学的语境中予以探讨。所以，本书将重点关注性别与经济基础、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关注女性由内而外，在私人领域和公众场域之间穿梭、驻留的活动、心态和影响；关注女性在社会整体存在中的位置；关注不同阶层、不同时段的女性之间的差异，等等。通过上述考察从而展现出：女性文化不应被想象或定义为一种简单空洞的粉色书写。它有着更复杂、更精密的内涵，同时也具备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意义。

第三，本书的意义还在于，采取“双重视野”，从官方意识形态、主流文化观念、女性自我视角等多个层面来关注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明末至清朝中叶的男性文化精英与政治领袖，即通过发掘女性作为参与者出现在由男性主导创造、选择书写的传统政治史，来重新思考似乎已成定论的主要历史问题，改变女性在传统政治叙述中的失语现象。明清时期，桐城一邑的进士多达 240 余人，身居朝廷要职的人数亦蔚为可观。当文人方以智、方苞、姚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桐城男性的英名被记忆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辉煌刻写时，我们不应忽略，在这束耀眼光芒背后重叠闪现的影像——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群体。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曾如此感慨：“方氏兄弟之苦节，实半成于闺房之内。”^①的确，在阅读有关桐城的文献材料时，这样一种印象常常不由自主地浮现于笔者的脑海：那些内闱之中的女性，通过与男性精英在智识、道德、政治等方面的多重互动，切实参与着外部世界的文化和权力运作。内帷之深，庙堂之高，相去复几许？本书通过社会性别这个新的考察点，重新透视那些士人魁首、帝国宰辅的思想、行为及其内因，从而对明清政治和权力关系进行再检查。

二 文献综述

本书在进行文献综述时，将不仅仅局限于安徽桐城地区，而是在一更为宽广的地域范围内作学术史的回顾。其他地区的此类研究，无论是在材料或是方法上，也都得到一定的借鉴，以下将分别予以简要的介绍。

首先，关于本书的研究地域——安徽桐城地区。截至目前，主要有下列研

^①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三联书店，2004 年，第 92—93 页。

究文章：祖晓敏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①、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②、吕非的《清代桐城女性诗词初探》^③、郭永锐的《方以智家族女性作家论略》^④、胡中生的《明末清初桐城才女方维仪的身世与思想》^⑤、连文萍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以两部明代诗话为论述中心》^⑥、李湜的《方维仪和她的〈观音图〉轴》^⑦、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⑧等。祖文侧重于从成因的角度，分析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她总结出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理学的盛行、婚姻的需要、母教的要求及当地特有的文化氛围等五大因素；其后，她以桐城的方氏才女为个案，论述了她们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在文章的最后，她指出了桐城女性文学的局限性及其原因。不过，该论文仅为我们呈现出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大致轮廓，研究的覆盖面和深度有所欠缺。例如，桐城除了方氏名媛之外，张氏、姚氏等大族中也诞生了诸多才女，其诗文作品亦颇为丰赡。像康熙、雍正两朝宰相之家的张令仪，存诗1025首、词89首、古文杂述1卷。可惜，她们均未成为该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另外，许多有价值的女性文学文本如《纫兰阁诗集》、《蠹窗诗集》、《蠹窗二集》等或未见征引使用，或未被深入地解读和分析。许文仅论述了明末以方氏姐妹为中心的桐城才女的群体文学活动。吕文指出，清代桐城女性诗词具有整体形象鲜明而个性色彩趋淡，自然质朴与文学审美并用以及家族文化现象非常突出这三大特点。郭文分析了方孟式、方维仪、吴令仪三位桐城才女诗文创作的艺术特点。胡文简述了方维仪的生平经历、文化思想及文学活动。连文考察了方维仪的文学批评活动，对其著作《宫闱诗史》的评品标准等予以了探讨。李文从绘画史的角度，以方维仪的画作《观音图》轴为例，介绍了方维仪

① 祖晓敏：《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合肥：安徽大学，2006年。

② 许结：《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载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9—362页。

③ 吕非：《清代桐城女性诗词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第12—15页。

④ 郭永锐：《方以智家族女性作家论略》，《运城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40—42页。

⑤ 胡中生：《明末清初桐城才女方维仪的身世与思想》，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所：《桐城派与明清学术文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7—489页。

⑥ 连文萍：《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以两部明代诗话为论述中心》，《汉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177—200页。

⑦ 李湜：《方维仪和她的〈观音图〉轴》，《文物》1994年第10期，第95—96页。

⑧ 邓丹：《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戏曲艺术》2007年第3期，第51—56页。

在美术史上的成就。邓文对桐城张氏家族的著名才女张令仪的生平进行了考证，标举其确切生年。

其次，以江南地区女性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论著非常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①、《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②，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③，郝丽霞的《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④、《明清吴江沈氏家族的女性文学意识》^⑤及《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⑥，戴庆钰的《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⑦，陈水云、王茁的《文学女性从闺内到国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⑧，朱英的《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⑨，王细芝的《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⑩，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⑪，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⑫，等等。其中，李真瑜等人的文章或论著分别对江南各大文学世家中女性作家的生平、作品及由此折射的女性意识等进行了考察。王细芝的文章则指出，清代闺秀诗人多集中于江、浙一带。此地安定的社会、发达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造就了江、浙仕女细腻柔婉的审美趣味而有别于北方

- ① 李真瑜：《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59—63页。
- ② 李真瑜：《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7—11页。
- ③ 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132—137页。
- ④ 郝丽霞：《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49—54页。
- ⑤ 郝丽霞：《明清吴江沈氏家族的女性文学意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8—72页。
- ⑥ 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 ⑦ 戴庆钰：《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130—133页。
- ⑧ 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国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1—6页。
- ⑨ 朱英：《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⑩ 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26—28页。
- ⑪ 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 ⑫ 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女性。陈玉兰及李汇群的论著不约而同地选取两性互动的视角，高度关注作为清代文学转捩点的嘉道时期，男性文人群体与女性的文学交往，彼此之间的渗透与影响。

与大陆学者相比，港台及海外学者特别强调研究语境和性别视角，由此为此类研究拓展了新的路向。如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①一书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明末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以三重动态模式取代“史观”，从而再现了江南才女具体而微的多样生活、女性文化空间的建立等。书中不乏新颖而大胆的立论，然而在材料的运用分析上难免有失偏颇之处。曼素恩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的研究时段^②则承接了《闺塾师》所讨论的明末清初，主要探讨了十八世纪中国妇女在社会性别关系变革中的写作、娱乐、阅读和宗教信仰等生涯。该书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卷，对主要时代脉络有着相当的宏观把握。此外，魏爱莲的《十九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关系网络》^③一文，重点分析了17—18世纪女性文学关系网络的发展、传承和异同。她运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将男性文人的影响力与女性文学关系网络的分析独立开来。

第三，与丰厚热闹的江南女性研究相比，其他地域的女性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和冷清。只有王成、朱芹的《明清徽歙才媛闺秀生活透视——从〈歙事闲谭〉著录之女性创作谈起》^④、罗春兰、邹艳、潘永幼的《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⑤、宋清秀的《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以王照园、李晚芳为例》^⑥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大略展现出安徽徽州、江西、山东、广东等地文学女性的若干剪影。这种研究上的不平衡性固然与这些地区地理位

①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蓓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 魏爱莲：《十九世纪中国文学女性的关系网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06—116页。

④ 王成、朱芹：《明清徽歙才媛闺秀生活透视：从〈歙事闲谭〉著录之女性创作谈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25—129页。

⑤ 罗春兰、邹艳、潘永幼：《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94—99页。

⑥ 宋清秀：《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以王照园、李晚芳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5—39页。

置、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难以和江南匹敌有关，但也有研究面狭窄、资料挖掘不深等主观因素。

纵观上述明清女性文学、文化研究，首先，从整体上看，大部分研究者着力于若干单个的点，以点带面、由小见大的多维立体研究不足；其次，在研究观念上，研究者们对女性与文化现象、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关注还不够充分，对文本进行诠释、分析的深度还可进一步加强；最后，在研究材料上，并未很好地利用明清文献丰富的资源，主要还是以单纯使用女性的文学文本为主，而对诸如男性文集、地方志、墓志、碑刻等材料的发掘、运用尚不充分。上述各类问题，都是在今后研究中有待拓展与深化的。

三 论著结构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首先，绅士家族中的“绅士”一词，采用张仲礼的定义和阐释，即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者。绅士阶层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上层绅士包括官吏、进士、举人和贡生，下层绅士为各类生员。绅士家族则是至少连续三代以上有科举功名获得者的一姓家族。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这些绅士家族中为母、为妻、为女等具有正式家庭身份的女性，统称为“闺秀”。当然，在论述中对处于该阶层边缘位置或下等阶层的女性也会有所涉及，如绅士家族中的妾和婢女等。其次，从地域来说，被纳入研究范围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出生、成长于桐城，又嫁给同乡的女性；一类是出生、成长于桐城，婚配外地男性的女性；一类是外地籍贯、嫁入桐城的女性。在这三类中，以第一种类型的女性人数最多，也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最后，关于才女之“才”的定义。这个“才”主要是指文学方面的才华，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才艺，如书法、绘画、琴艺等。

本书分四章，重点论述以下问题：

第一章，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生长之背景。

17—18 世纪，与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同，桐城居于内陆，系山城，在经济上仍以传统的农耕为主，经济思想上也依然是农本主义、重本轻末。桐城自明朝中期以后，士人的仕宦之途日趋兴盛。出身桐城的士大夫们以本地传统、家教传承糅合个人修为与追求，形成了自己的仕宦之道，并躬行

实践。此外，通过对一代宰辅张廷玉与雍正、乾隆君臣关系演变的条分缕析，更深刻地反映出桐城士大夫的政治作风与理念。桐城绅士家族无论是在家学还是家风上，其主流都是守护传统与礼法，呈现出平实、清澄、含蓄、淡泊的特质。在家学方面，其共通点在于重视经史之学和实用性的学问。至于家风，总的原则是守正避奇、远追古道。他们非常强调家风的谨肃，尤其是在杜绝城市文化和时代文化的不良风气方面。同时，桐城绅士又是达观精神的实践者，他们做出政治选择的出发点和根本立足点，皆出于以维持和发展家族利益为第一要义的现实主义。桐城绅士家族的士人，无论是以遗民自居，还是服务于新朝，在学术和文化风气上恰好与清代四平八稳的文化特质相吻合。他们讲求实用、反对空疏，恪守礼法、不尚轻浮与怪奇，崇尚朴素无华、舍弃奢侈与堕落。

第二章，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之婚姻。

出于守护和巩固地方与家族利益的目的，桐城绅士家族通过门第婚、姑舅婚、入赘婚等形式，在本地和江南地区结成联盟关系。特别是与江南士人的婚姻缔结，无疑可以加深两地士大夫家族的学术关系网和亲族关系圈，为家族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到更多的有力盟友来保持和巩固业已取得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桐城绅士家族夫妇们的婚姻生活，就整体状况而言，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尽心维护两人、两个家庭和家族之间的结盟。由此呈现出的夫妻关系可谓敬爱有加、情欲寥寥。无论是男性在纳妾问题上的不重美色、不以娱情享乐为目的，还是女性在子嗣问题上积极主动地为夫纳妾以绵延宗祀，都清楚地反映出绅士家族中的男女双方均忠实地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动指南，不追求危险的激情，不过分放纵个人情感，以家庭和家族的繁盛发展为第一要旨。这也与清朝政府大力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政策相吻合。作为保守派代表的桐城精英阶层男女，以自己的守古作风，换得家族的节节进取；以自己的平实生活，换得桐城绅士家族在 17—18 世纪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光华璀璨。

第三章，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之生活。

根据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她必须遵从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处理好家庭中各种人伦关系。对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的闺秀而言，世代同居大家庭中的关系复杂而多元。她们要维护家族、家庭内的差序格局，分贵贱、别亲疏，以不失其伦。最关键的是，她们必须扮演好妻子和母亲这两大重要的社会性别角色——辅助丈夫以成就他在公共世界所能

取得的声名和地位，教育儿子使其成为合格的儒家弟子；激励他们追求荣誉、捍卫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娘家的荫底下，桐城绅士家族闺秀通过对奁产等独立经济资源的自由支配，提高了自己在父系家族中的地位，为一姓门户的和谐与发展发挥着切实的作用。这或许是女性在父权制荫底下，凭借物质力量获得的一种弹性和机会。此外，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地方社会公共事务中。她们通过所掌握的一定的家庭经济权力，拓宽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层面，也得到了宗族与地方的认可。

桐城绅士家族闺秀在此“女教母范”昌明的环境里，不仅有着一般的道德行为如守节，也不乏某些激烈的极端选择，如殉夫、割股、万里寻夫等。这些均是儒家伦理道德在清代趋于宗教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桐城绅士家族中的那些女性大多并无所谓的受害感，相反，她们的内心充满了严守礼教的自觉。她们视这一牺牲自我幸福的行为为振兴儒家伦理道德的天职。这些女子，以自己人生的断裂和破碎，换得了家族延续和完整，并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从而在某种层面上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圆满。儒家社会性别体系内的这种激励机制，为本身即为儒家文化产物的女性们深深认同并推动其运转，儒家传统因而得以长久延续下去并日益巩固。

虽然端居于内闼是17—18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的生活常态，但是在门户之外，无论是在桐城境内的出游，还是跨省的长途旅行，对这些闺秀而言也十分常见。旅游使得闺秀参与到公共世界的生活中去，并为她们带来了新乐趣、新知识和新态度。然而，闺秀在进行充满个人愉悦体验的旅行时，并不曾忘却自身的性别角色和职责。她们力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女性的主观愿望坚持了道德上的坚定、纯洁与自省，就算身体处于流动状态，仍是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理想女性。在绝对隔绝的理想与相对灵活的自由空间之间，这些帝国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显然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从而既利用既有资源成功运作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拱卫着她们所深深认可的儒家道德传统和性别体系。

第四章，17—18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之创作。

桐城绅士家族对于女性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绝大多数桐城闺秀不仅具备优秀的文化知识，还拥有出色的艺术才能，如书法、绘画、琴艺、篆刻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绘画，特别是白描技法，堪称一绝。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

养为桐城绅士家族女性在诗文创作方面的卓越表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些才女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形成了非正式的女性社团，以家居式、社交式诗社为主，并发展出一种女性文化。当时较为知名的桐城闺秀社团，有明末方孟式姊妹和吴令仪姊妹的“名媛诗社”，明末清初陈舜英、方御、张莹等人的社团，以及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的以张令仪为中心的张氏闺秀团体等。姚鼐等桐城的士人们也对家族中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表示了赞同和大力支持，并编选了一些闺秀的诗歌作品，刊刻于世。在儒家士大夫眼中，真正的诗歌是道德的声音，真正的女性诗文裨益于教化。那些有才华、有学识的闺秀是可以传播道统的。

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闺秀诗歌写作的主要内容为闺阁生活、朋辈交游、山水田园等。其诗风大多归于自然，以平实白描、清朴纯真见长，绝少纤巧华靡的脂粉之气。这些女性在诗文中集中呈现出的不仅是完美和典范的一面，更有另外一种影像：有抱怨、牢骚、懊恼、惆怅、迷茫、痛哭，有对生活和现实的评判，有心底隐藏的渴望，有未能实现的理想，等。有的表达甚至与文字之外的实际行为相矛盾、相抵触，种种或可视为更真实的自我心声的吐露，其诗文也因此呈现出丰富的创造力和独特的私人性。无论是方维仪还是陈舜英、张令仪，17—18 世纪桐城绅士家族的闺秀抱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妇德和文才在女子身上是可以共存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提出了公开质疑；相反，这反而证明了女性亦坚决支持男性为更高价值层面的社会性别等级这一意识形态，更加强化了性别不平衡和性别区分长存的现实。此外，她们也坚定地认为：才华只是道德的附庸，女子应深自内敛，不以求才求名。她们心无旁骛地信奉着给予其利益的儒家传统，对它进行阐释，并将其发扬光大、传递下去。

四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本书拟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综合研究。首先，本书将研究对象置于时代和地域的语境之下，利用官修方志、国家诏令、个人文集、民俗书籍、宗谱等进行分时段、分阶层的研究。其次，将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方法。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范畴，已经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本书将从官方

意识形态、主流文化观念、女性自我视角等多个层面逐一分析，采取“双重视野”，即全面关注男女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相互作用，关注女性在社会整体存在中的位置，将女性闺帷空间和男性政治空间紧密联系起来。此外，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采集、阅读、校勘等，整理出明清时期桐城地区女性著作目录及个人生平小传。